



周天勇：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关键



文/《财经》记者 孙颖妮 实习生 张静伦



采访和编者导语

1978 年以来,党和国家在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上,肩负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的艰巨任务,中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在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周天勇看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后的产品和要素市场化改革、城镇住宅和出让农村土地资产化改革,就不可能有 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奇迹。

党的二十大报告描绘了中国未来发展的蓝图,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一个现代化强国,经济发展在 2035 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提出要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着力破解

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

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提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明确提出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要“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当下的中国面临着更为宏伟的目标：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此外，中国还要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和实现共同富裕。对此，周天勇表示，中国要实现这些目标必然还需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来支撑，而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也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

“只要改革开放就能实现国家的基本现代化。”

“中国作为二元体制经济的国家，如果没有改革释放生产力，未来必然是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周天勇表示，不同于已经完全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一元体制”国家，中国依旧是计划与市场长期并存的二元体制国家。由于体制扭曲造成产出损失，也形成体制扭曲性的资源、资产和能力等剩余和闲置，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只有继续进行和深化

体制改革，体制扭曲才能被纠正，体制性扭曲所禁锢的经济潜能才能得到释放，从而利用潜能来促进经济增长。

周天勇认为，当前中国未来面临着经济陷入低增长区间的风险，经过实验室计算，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改革措施扭转，2026 年及其以后的 GDP 增长速度可能下降到 3% 以下，进入偏低速度增长区间。

当下的中国面临着诸多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大、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总需求不足等问题长期存在；短期来看，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市场主体预期转弱、民营企业信心不足……在周天勇看来，这些问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二元体制扭曲造成的，解决这些问题也只有通过改革。

接下来中国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改革将激发中国哪些经济增长潜能？如何通过创新提高发展质量？周天勇教授 10 月 18 日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近期发表前又对采访稿进行了补充。

二元体制经济需要继续改革才能避免自然低速增长

《财经》：近两年，您在诸多场合以及文章中多次呼吁中国要继续发力改革，为何改革对当下的中国如此重要？

周天勇：当前，中国依旧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居民尤其是农村农民的收入消费水平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离富裕国家居民生活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同时，中国还要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

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些目标的实现都需要较高的经济增速来支撑。然而，当前中国已经开始面临经济陷入低增长区间的风险，我们实验室仿真计算，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改革措施扭转，2026年及其以后的GDP增长速度可能下降到3%以下，进入中偏低速度增长区间。

我们需要警惕，如果GDP增长速度不能稳住而继续下行，可能会引发系列严峻风险。例如，经济增长速度越低，养老金缺口会越大。由于我国计划生育时间过长和力度过大，当前人口结构老龄化速度太快，养老金缺口会越来越大，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用新增的GDP加以补充和平衡。

根据相关团队的研究和日本老龄化数据，2021年至2025年，中国养老金缺口达4.77万亿元，2026年至2030年缺口达10.58万亿元，2031年至2035年缺口已经达到22.23万亿元。想想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如果我国实际GDP增长速度过低，养老就会陷入无米之炊境地。

所以，考虑就业需要、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公共服务提供、养老需要国情、政权运转保障、国防实力和共同富裕来源，中国经济未来必须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根据我们计算，2035年的年平均GDP增长速度需要保持在5%-6%区间内，至少不应当低于5%。

对于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其自然经济增长速度是繁荣和萧条决定的，对于计划和市场并存的二元体制国家来说，自然经济增长速度则由体制不变动而形成，其最大可能的经济增长潜能被禁锢在体制扭曲之中，

体制不变就是较低自然经济增长速度。

《财经》：如何理解二元体制国家只能通过改革摆脱低增长？中国二元体制经济增长与“一元体制”国家相比有何不同？

周天勇：不同于已经完全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一元体制”国家，中国市场化改革还并没有完成，依旧是计划与市场长期并存的二元体制国家。二元体制下，过去实行了计划生育，现在还存在着土地计划配置、资金借贷对民企歧视、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得人口不能自由流动、城乡劳动力工资和社保存在较大差距等系列问题。计划和行政管理观念和操作时有回潮。

例如，劳动力流动方面，长期以来，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得城乡户籍居民享受着差异化的教育、医疗、土地、养老、社保等公共服务和政策，比如城市工作的农民工，许多地方限制其在城镇中购房购车，其子女在非户籍地不能享受到大城市提供的教育公共服务，这就是二元体制的体现。

由于存在二元体制，配置机制扭曲是国民经济中的常态现象。其中，一些扭曲是可以纠正的，比如银行对国有企业贷款的平均利率为 4 个百分点，对民营企业贷的平均利率却为 8 个百分点。此时会有民企挂在国企名下经营，让国企帮忙做贷款，或者将国企的资金转贷给民企，这样民企额外的借贷成本就有所降低，但也有变通成本和风险。这些现象的出现其实就是对二元体制扭曲的纠正。

但很多体制扭曲是不可纠正的，比如不向农民分配建设用地指标和违建拆除造成的扭曲就不可纠正，明明农民的土地在村里闲置着，农民在地里建了一个猪场，但是由于土地是计划配置，该农民没有用地指标，没过几天土地被地方政府强拆了，这就是扭曲的不可纠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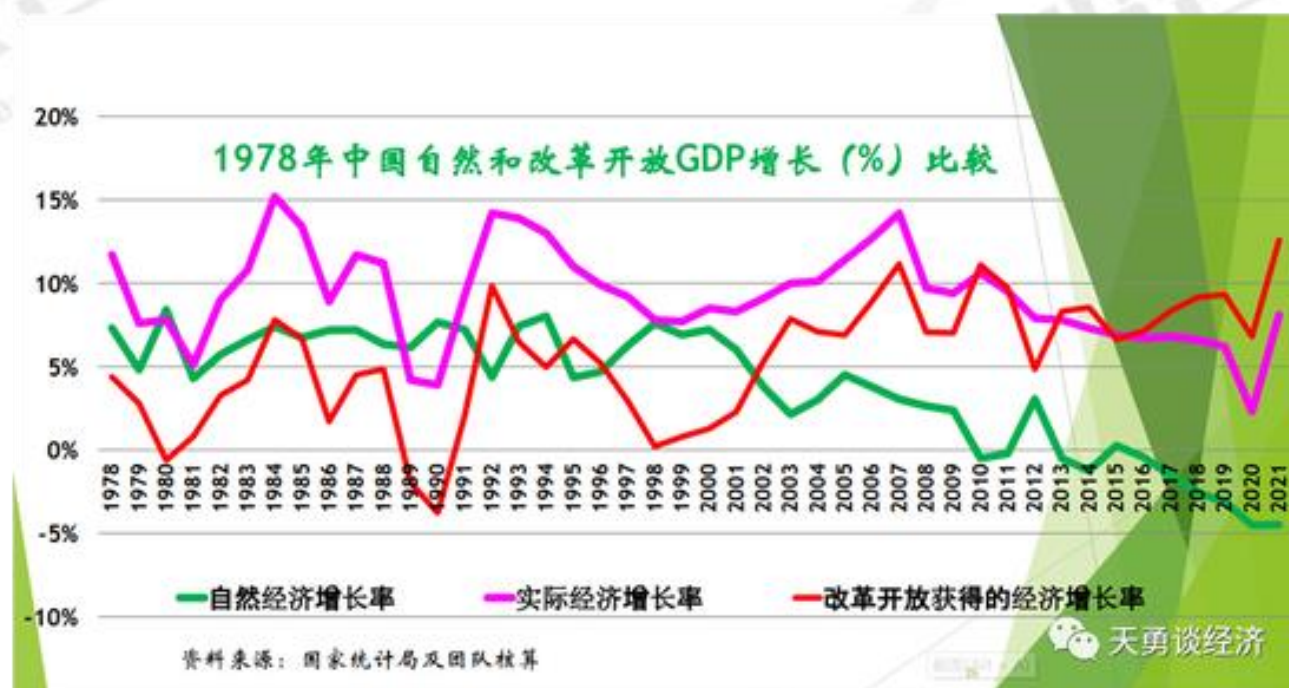
此外，劳动力要素配置方面的户籍管制所附加的子女教育、居住成本、医养社保和土地粘性等体制扭曲，国有企业资本使用低效率扭曲，土地要素配置方面的禁止交易等扭曲，许多根本无法变通，或者变通的成本和风险大于变通的收益，均无法由市场主体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所纠正。

纠正这些二元体制造成的扭曲只能通过改革。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处在萧条周期时，表现为经济流动性不足，因此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流动性。而二元体制国家由于体制扭曲造成体制性的要素剩余和资产剩余，导致产出损失。只有进行体制改革时，体制扭曲才能被纠正，体制性扭曲所禁锢的这些剩余要素和资产其生产力和价值等内在的潜能才能得到释放，从而利用潜能来促进经济增长。

《财经》：如何理解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周天勇：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就是很好的例证。1978年以来，改革是释放生产力和获得增长新潜能的关键，经过我们团队的计算，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国自然经济增长速度最好也就是 3.76%，且增速逐渐下降，从 2014 年开始变为负的。

而且通过研究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增长变动规律，我们也发现，凡是重大改革推进时期，GDP 增速加快，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也加快；而凡是重大体制改革任务结束，还没有接续下一次重大改革时，GDP 增速放缓或下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也回落。



图片来源：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

例如 1978 年至 1985 年期间，中国深入推进联产承包、企业放权、价格市场双轨制改革，这段时间的 GDP 增速加快，此后几年相比有所放缓。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8795

